



## 核心阅读

考证市场乱象的形成,说到底还是利益驱使。因为它有利可图,加之监管不到位,就滋生出种种乱象。治理这些问题,需要调整利益关系,但这个调整不是增量调整,而是存量调整,要对现有格局下大力气、下大决心予以清理。



马庆钰

余晖

褚宏启

## “人在证途”，哪些证书该取消

■本报记者 王卉

前不久,人社部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等1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资格培训、考证市场可谓高烧不退。有专家估算,当前我国每年考评各类证书的经济总额超过3000亿元。据报道,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考的证书竟有上百种,真可谓“人在证途”,而其中有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资格证。

由于职业资格认证市场的乱象饱受诟病,接下来国家还将加大力度清理职业资格许可,11月份将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

## 考证乱象

1994年,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科学评价人才的一项制度,被写入《劳动法》。此后,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应运而生,并催生了各种培训热、考证热。

有业界人士表示,应该看到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产生以来,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职业标准、技能提升和职业道德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有些职业资格证的设置,纯粹是人为地为职业设置障碍,结果并没能促进相关领域人员素质的提高,没有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却人为抬高了从业门槛,成为一些机构获得利益的方式。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逐渐成为相关政府机构类似于审批的职权。原本是为了保证职业水平,提升职业能力,规范职业准则。但在实践中,却逐渐趋于无度和失控,围绕资质资格的认定许可,职能部门管理行为走向扭曲,形成了设租寻租的特殊利益链条。和其他审批权限一样

受到社会的质疑。其中愈演愈烈的乱象,窒息市场正常运转,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产生另类腐败现象。新一届政府清楚认识到应与其他不合理审批权一样进行彻底清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学部副主任马庆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清理前首先需有一个大体的估计,之前国务院委托国家行政学院作为第三方对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组发现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中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在有些领域,规定相关规划院、设计院、评估中心等,开展某项业务,必须要满足一定职业资格人员数量的要求,否则就不能挂牌运行。由此逐渐催生出资格证书的交易现象——执业机构向手中有资格证书的人通过付酬方式借用资格证,成为名义编制,满足有资格证书人员数量的要求。有证书的人只挂名,不去工作。

“极端的情况是,有些领域的一个证书一年能卖到六七十万元,成为暴利。”马庆钰说。

在评估当中他们还发现,不仅资格证书已成产业,政府监管也被软化和腐化了。“相关举措软弱无力,当管理部门发现资格证书交易现象时,最多也就是停止资格有效期三个月,这种所谓惩罚可以说是隔靴搔痒,毫无意义。”马庆钰表示。

审批与许可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会计系主任、副教授尹东说,据他所知,一些职能部门靠手中掌握的权力,与培训机构结成利益同盟,中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 如何管理

马庆钰认为,职业资格管理的改革,并不

意味着把所有资质门槛一律取消,而是进行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符合企业和社会自身要求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要把资质和资格管理权在恰当的原则下交给市场,而将监督权留给自己就可以了。

马庆钰评价,总的看,有些资质资格的设置,比如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之类,不具有必要性;它们对整体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经营和发展事业,并非不可缺少,反而是给市场经济徒增障碍,干扰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降低了效率,妨碍了就业自由。

“2014年6月和8月,国务院两次取消了58项由中央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和认定事项,目的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松绑,减少政府不当管理造成的束缚,交还经济和社会各类主体的自主权,刺激市场活性。”马庆钰说。

马庆钰认为,职业资格和资格,毕竟还有一些需要保留。到底哪些需保留哪些需取消,还是应该评估。

人社部专家介绍,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人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人类资格,如果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并不密切,或者自身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进行管理的,将建议按程序提请修改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

据了解,根据下一步的清理计划,国务院行业部门、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原则上予以取消,确实需要保留的,经过批准后,纳入国家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度管理。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由政府部门制定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具体认定工作逐步移交各行

业协会、学会承担。

## 两难困境

“一些资格证对就业供需双方都是需要的,但这其中肯定会存在虚假的、有水分职业资格,这个市场是需要净化的。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重视信用的国家,这些职业资格证书都是由行业协会颁发,比如说美国医师的执业证,都是由美国医师协会来颁发,而不是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如是表示。

“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成为所有证件的发行者,政府只是让市场来提供这种信用产品,政府做得越少越好。”余晖说。

两难处境在于,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是靠政府靠不住,靠行业协会也靠不住。

余晖解释,我们国家的行业协会,从它的治理结构来看,很多有治理不足的地方,民间信誉到目前为止没有养成。“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失范的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行业协会都是官办的,还由政府操作,因此很多行业协会被称为‘二政府’,包括很多离退休干部以及公职人员会到行业协会兼职。”余晖说。

“下一步的社会组织改革应该而且已经向这方面开展,希望相关工作能走得更快更好一些。”余晖表示。

有专家评价说:目前政府主动限权,向“小政府,大社会”迈进的节拍,尤其值得称道。政府相信市场、相信社会,这样才会把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得更好。

## 资格证书取消,职业教育别放松

■本报记者 王剑

证应该取消,哪些应该保留?以什么为依据?

褚宏启:至于哪些资格证书该取消,哪些资格证书该保留,要根据我国目前职业发展的状况,同时,职业分类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这一国家标准,要经过行业协会严格调查和研究,再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定,不是谁想设置就能设置的。8月份人社部已经取消了11项资格证,这11项资格证大多和高利润行业相关,利益越大其中的腐败现象和不规范的行为就越多。加之房地产等是新兴行业,其职业资格到底如何来确定,标准是什么,要有什么样的培训、教育课程来保证职业能力的实现,这些尚未成熟。

这只是一个信号,背后可能要涉及到综合治理的问题。我国下一步要把质量作为国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在我们很多东西质量都不过关,说到底,跟职业能力有很大关系。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专业

性的要求,达不到专业要求就发证书的现象都是应该整顿的。

职业的发展、分化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新产业的产生,一些职业就会产生。而新职业的产生,它的职业标准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现在一些高利润行业背后对利益的追逐。我觉得这种治理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也许今后这个职业更加成熟,政府的顶层设计更加到位了,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能会再度出现,因此,我认为这次的取消未必就是永远地取消,目的主要在于更好地规范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中国科学报》:取消了某些职业资格以后以什么来衡量求职者的职业能力?

褚宏启:有些职业标准是很高的,要求从业人员达到专业程度,这就需要以资格证书作为衡量的尺度,因此职业资格证书是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如果全

部取消,就意味着促进教育体系愈加完善的倒逼机制被放弃了。关键是,应该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清理、规范。

从我们现在的教育发展来看,普通教育相对比较强势,职业教育社会需求很大,但是家庭需求、个人需求并不是很大。现在在中职、高职就读的学生往往都是成绩相对不太好的学生,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有多种方式,除了让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能够更好地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职业证书制度也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就是所谓的从后往前的倒逼机制。

所以,我认为职业证书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就否定它、扼杀它,而是应该进一步改进完善它。

## 思想者

##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 - 1920)

国籍:德国 代表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古犹太教》  
主要成就: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一位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作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 评价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地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想体现了一个博大的智慧之神。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 问道

面对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就业形势,拥有“一纸文凭”早已不足为奇,人们纷纷诉诸于“考证”来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催生了一些新兴行业并促使我国职业就业标准国际化,考证种类和范围不断增加,“考证热”之风愈刮愈烈。据《广州日报》报道,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考的证书竟有上百种。有关数据显示,大学生的考证率已经达到了68.7%,而在暂时没考证的大学生中,也有76.23%的人有考证意向。

“考证热”现象之所以不断升温有很多内外因素。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对“证书”的盲目崇拜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推手。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除了看大学生的学历文凭外,越来越关注求职者是否拥有其他的职业资格证书,他们普遍认为具备职业资格是从事某种职业所必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意味着相应的职业素质,是能够胜任该项工作的一个依据,拥有证书的求职者可以更快胜任职业的要求。诚然,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认真地评估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此时相关含金量较高、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证书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必须具备强制性上岗证书的岗位招聘,用人单位无疑会有限名额录用有该类证书的大学生,所以用人单位倾向于录用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求职者以降低录用风险,节约培训成本。

除此之外,自高校扩招以来的高等教育结构失衡也应为“考证热”负一定责任。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不够完善,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仍然偏低。高校教材的知识结构滞后,教学方式落后,专业课程设置陈旧,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够,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薄弱环节,另外现有高等教育资源还不能提供学生充分选择专业的自由,专业面窄,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样的体制下培养出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马上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而当前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需要人们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竞争。大学生为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满足社会的需要,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往往会选择通过“考证”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因此,证书在高校内才有了一个存在和升温的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考证热”在提高大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也必然会造就大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根据眼前利益决定学习内容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们不是由最终目的明确信念和关于个人幸福的传统定义所推动。只是由效率精神和技术能力所驱使的。这样人们不断地追问如何适应外在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并努力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完全成为外在利益的附庸。”目前出现的“考证热”正是这种功利化倾向的明显表现。

大学教育的实质本在使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涉猎其感兴趣的领域,加深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激发其创造精神和创造力,成为高素质的人。但是,大多数学生考证的过程、目的及结果都只是将“证书”作为一种工具,这和个人成才和提高能力的最终目的南辕北辙。

本身是为了纠正“文凭热”、证明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职业资格证书如果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将会成为教育功利化的另一个反面教材。

“人在证途”有待解救,其根源即在于反思这种功利化的评价和教育方式。

用人单位应转变观念,不应以证书作为选拔、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在招聘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应聘者的专业技能与个人素质,并且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招聘刚毕业大学生时,企业更应看重的是被招聘人员的教育背景、所学专业、技能与个人的基本素质以及今后职业发展的潜力,看其是否能够适应企业的企业文化;若是招聘中高级人才,则应看重被招聘人员的工作经验。此外,用人单位应该允许大学生有一个锻炼成熟的过程,而不应将这一过程完全推给学校、推给学生。

考证热的背后,是人们对证书、证件的盲目崇拜。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以是否有证书作为筛选的依据。毕竟,当用人单位无法对应聘者进行更多了解时,证件似乎就是能力的写照。有市场才有需求,没有社会上对证书的迷恋,就不会产生“证书热”。

现阶段,重振职业教育已被提上日程。好的高等教育不应只是培养“科学家”,也应该培养具有职业技能和健全人格的普通人。当我们的教育回归教育的本义时,各种功利化的、异化的教育现象才有可能从根源上得到解救。

## 打破证书崇拜才会『退烧』

■韩天琪